苏 轼 传

一、少年不凡

苏轼这个名字，在我国可以说是妇孺皆知。他不仅是一个大文学家，而且还是大书法家、画家。关于他的轶事流传甚多。

苏轼，字子瞻，号东坡居士，四川眉山县人。他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,照公历推算,是一〇三七年一月八日。

他出身于一个富有文学气氛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。父亲苏洵,字明允,因屡试落第,愤而烧毁自己的文章,再度悉心攻读,终于成为著名的古文家。哥哥景先，早卒。弟弟苏辙，字子由，是苏轼一生政治上和文学上的同道，两人感情十分深厚。由于父子三人的文学成就,并称“三苏”,又分别称为“老苏”“大苏”“小苏”。苏洵曾自称“布衣”“堕在草野泥涂之中”苏轼也说“生于草茅尘土之中”,苏辙在《上枢密韩太尉书》中说他“居家所与游者,不过其邻里乡堂之人，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”，都反映出一个并非富有的中小地主之家的境况。

苏轼八岁时人乡校读书。老师是天庆观道士张易简，他在近百个学生中独独赏识苏轼。苏轼对这位教了他三年的启蒙老师，直至晚年谪居海南岛时还梦见他。十岁时，改由母亲程氏讲授。十二岁时，苏洵从外地求宦游学返家，苏轼和九岁的苏辙便由父亲教授。一次,苏洵命他俩作《夏侯太初论》。夏侯玄(字太初)是三国时魏国的重臣。当时司马师继其父司马懿之后专权篡政，任大将军。夏侯玄参与了推翻司马师的密谋，事泄被捕。他临斩时，颜色不变，举动自若。据说他平日即处事镇静，一次“倚柱作书。时大寸霹雳,破所倚柱,衣服燋然,神色无变,书亦如故”。(《世说新语·雅量》)苏轼借以评论说“:人能碎千金之璧,不能无失声于破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釜 能搏猛虎,不能无变色于峰 蚤”，极力形容人们在有思想准备和无思想准备时表现的不同，推崇夏侯玄临危不惧的精神。这两句话，初次显露出苏轼随机生发、翻空出奇的雄辩才情，受到苏洵的称赞。苏轼成年后还把它用在他的《黠鼠赋》和《颜乐亭诗序》中。

幼年的苏轼不仅受到深厚的祖国传统文化的熏陶，而且也接受正统的儒家经世济时的政治理想的教育。他八岁开蒙的那年，即庆历三年(公元 1043年),宋仁宗正锐意改革弊政,撤换吕夷简、夏辣等保守派大臣，起用范仲淹、韩琦、富弼、欧阳修等革新派人物，政局有所刷新。国子监直讲（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的官员)石介写《庆历圣德诗》加以颂扬。这首诗传到了四川,苏轼诵习之余,对韩、范、富、欧阳四位“人杰”十分仰慕。他的母亲程氏是一位有政治见解的妇女，有次她给苏轼讲《后汉书·范滂传》。东汉“名士”范滂反对宦官专权误国,汉灵帝建宁三年(公元 169年)大逮党人，他镇静自若地前去投案，其母和他诀别说：“汝今得与李、杜齐名,死亦何恨 既有令名,复求寿考,可兼得乎 ?”程氏讲到这里,激动不已。苏轼问“轼若为滂,夫人亦许之否乎 ?”程氏坚定地答道“汝能为滂,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!”苏轼十分感动,“奋厉有当世志”。(《东坡先生墓志铭》)

苏轼正是怀着这样的政治抱负离蜀赴京，找寻出路的。

二、出蜀入京

嘉祐元年（公元 1056 年）三月，苏轼兄弟随父离家，从陆路自阆中（今四川阆中）、度秦岭，经关中，最后于五月到达汴京。

八月，苏轼与苏辙在开封府考进士，同时获选。按照宋朝的规定，府试以后还要经过中央礼部（负责礼仪、祭享、贡举等事）的考试和皇帝亲自主持的“殿试”。兄弟俩住在兴国寺准备应考，苏洵则投书欧阳修、富弼、韩琦等人，受到他们的重视。第二年正月，欧阳修以礼部侍郎（礼部的最高长官）、翰林侍读学士（给皇帝讲书的侍从官）知贡举。他对当时流行的奇诡艰涩的文风深为不满，把平易流畅的文风作为取士的标准。苏轼的考卷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得到他的特别赞赏。据说欧阳修读了他的文章后说：“不觉汗出。快哉！快哉！老夫当避路，放他出一头地也。经过仁宗的‘御嗽’”，苏轼赐进士及第，苏辙赐同进士及第。宋仁宗高兴地对他的皇后说：我为子孙得了两个宰相。

不料程氏在家病逝，苏洵父子只好回蜀奔丧。在封建时代，父母或祖父母死去，子孙辈必须谢绝人事应酬，如果是做官的人，还需解除职务，在家守孝二十七个月，叫做守制或丁忧。苏轼便丁忧家居。

嘉祐四年（公元 1059 年）十月，父子三人再度赴京。这次是走水路。他们经现在四川境内的嘉州（治所在今乐山）、泸州（治所在今泸州）、渝州（治所在今重庆）、涪州（治所在今涪陵）、忠州（治所在今忠县）、夔州（治所在今奉节），出三峡，到了江陵（今湖北江陵），已是岁末。一路上，碧波滔滔的长江，秀丽多姿的巫山，忠州的屈原塔，夔州的八阵图，其他如神女庙、昭君村、黄牛庙、虾蟆碚

等山川文物、名胜古迹，处处震荡着他们的襟怀，激发起他们的才思，他们写下了不少作品。江陵以后的路程，将改由陆路北上。为了纪念这次舟行，他们就把三人途中所作诗文一百首，编为《南行集》。其中有苏轼诗四十首，这是现存苏诗中的最早一批作品，可以看作他诗歌创作的起点。这些作品初步显示了苏轼的政治抱负和诗歌才能。

嘉祐五年(公元1060年）二月，苏轼到达汴京。礼部授予他以河南府福昌县（今河南宜阳县西）主簿的官职，办理文书等事务。但他并没有去赴任，而是与苏辙一起准备“制科”的考试。原来唐宋时除了“进士”、“明经”一类“常举”以外，还有一种皇帝特别下诏举行的考试，叫做“制科”。嘉祐六年(公元1061年)八月，苏轼以“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”考入第三等(为“上考”)，这是极大的荣誉。从宋初以来，被取入三等的只有吴育和他两人。考试毕，他被授予大理评事、签书凤羞府（治所在今陕西凤翔）签判的官职。苏辙考入第四等，被任为商州（治所在今陕西商县）推官(州的属官，掌管审案）；但因苏洵奉命在京修礼书，他奏请留京侍奉父亲。他送哥哥赴任，到郑州分手。

兄弟俩第一次离别，情绪不免感伤。唐代韦应物在《示全真元常》一诗中有“宁知风雪夜，复此对床眠”的名句，意思说，今夜雨雪对床畅谈，极惬人意，以后哪一天复能如此？苏轼回忆往昔兄弟俩同读此诗，感触很深，曾约定日后一起退隐，纵情山水。想到这里，觉得高官厚禄并不值得追逐。

但是，北宋初年积贫积弱的社会局势唤起他平素怀抱的济世之志，逼着他睁开眼睛正视现实。宋朝是比以往几个统一王朝更注重中央集权的朝代，它把军权、政权、财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到皇帝手中，这是宋代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。当时官僚机构庞大臃肿，腐败无能；在财权集中方面，规定地方财赋绝大多数上交中央，又刺激了上层统治集团的穷奢极欲，挥霍享乐，到宋仁宗时，国库空

虚；“惟存空薄”。这使固有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，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。开国不过三十多年，宋太宗时就爆发了王小波、李顺的农民起义，人数达数十万，就是突出的例证。宋朝缺乏抵御外来侵扰的能力，一直处在周围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之中，每年向辽、夏输纳大量“岁币”（银、绢），给财政造成沉重负担。

正是在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，有些改革家就出来主张“变法”，要求革除弊政，缓和危机，形成了变法运动。

庆历三年（公元 1043 年），宋仁宗任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（副宰相），富弼、韩琦为枢密副使（全国军事机关的副长官），要他们提出改革方案。范仲淹就提出“明黜陟”、“厚农桑”、“修武备”等“十事”。宋仁宗采纳了他的意见，并颁行全国，号为“庆历新政”。但事隔不久，就因保守派的反对而失败，范、富罢职，韩琦被迫出赴外任。

“庆历新政”的失败更促使社会矛盾的急剧发展。封建士大夫中仍然酝酿着新的改革浪潮，一些局部性质的改革活动也在渐次展开。这是王安石变法前的酝酿期。苏轼这时的基本政治倾向是要求变法。他写了不少政论文，从要求革新的政治理想出发，继承汉代贾谊、唐代陆贽的政论精神，结合历史经验教训，分析当前形势，研究治国之策。代表作就是考“制科”时所写的《进策》（包括总论性质的《策略》五篇、讲具体改革措施的《策别》十七篇、讲辽和西夏问题的《策断》三篇）和嘉祐八年（公元 1063 年）在凤翔任上所作的《思治论》。

这些政论文在风上深受战国时代纵横家的影响。它的特色是汪洋恣肆，辩才无碍。宋人李涂《文章精义》指出，苏轼上述《策略》等“论利害”的政论，学之于《战国策》，并说“苏门文字，到底脱不得纵横气习”，是正确的。它常被旧时代的举子们奉为楷式。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卷八曾记当时俗语说“：苏文熟，吃羊肉；苏文生，吃菜羹”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苏轼这类文章的影响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这一时期是苏轼诗歌创作的初步活跃时期。和政治上主张改革相一致，他的作品中也以关心国事、反映民生疾苦为重要主题。他经常作贫富悬殊的对比："蜀人衣食常苦艰，蜀人游乐不知还。千人耕种万人食，一年辛苦一春闲。闲时尚以蚕为市，恐忘辛苦逐欣欢。"(《和子由蚕市》)同是"蜀人"，若乐如此不均。这个对比正说明作者对封建社会中贫富对立的现象有着较深的感受。

天寒降雪，他叹道："有客独苦吟，清夜默自课。诗人例穷蹇，秀句出寒饿。何当暴雪霜，庶以蹑郊贺！"

他还写了一些指斥时弊的诗。如咏史诗《郿坞》，借古喻今，语多讥刺：

衣中甲厚行何惧，坞里金多退足凭。毕竟"英雄"谁得似？脐脂自照不须灯。

这首诗是嘲骂汉末董卓的。董卓是个奸相，怕人行刺，在衣内加了厚甲，自以为可以确保生命安全；他把民脂民膏搜聚在他所盘据的郿坞，扬言"事成雄据天下，不成守此足以毕老"。然而，他后来失败了，被暴尸长安，时遇酷暑，肥胖的躯体流脂满地，人们对他恨之入骨，就在他的肚脐眼装上灯蕊，象点灯似的烧了几天。诗的后两句说"照明不须灯，真算个"英雄"嬉笑怒骂，鞭挞有力。这时当时疯狂地聚敛民财的官僚贵族，无疑是个严重的警告。陈师道曾说："苏诗始学刘禹锡，故多怨刺"(《后山诗话》)，是不错的。

苏轼这时期的诗在艺术上也趋于成熟。组诗《凤翔八观》八首就代表他当时五七言古诗的成就。凤翔是有名的古都，文物很多，秦刻的"石鼓"，秦碑"诅楚文"，王维、吴道子画的竹和佛像，唐代著名雕刻家杨惠之所塑的维摩像，东湖，真兴寺阁，李氏园，秦穆公墓，被称为"凤翔八观"，苏轼都一一加以吟诵。尤如《石鼓歌》，从"冬十二月岁辛丑，我初从政见鲁叟"开始，写他嘉祐六年（公元1061年)冬，初到凤翔任，即去孔庙谒圣，见到石鼓，然后详细描写石鼓的文字和经历，最后以"兴亡百物自闲，富贵一朝名不朽。细

思物理坐叹息：人生安得如汝寿”作结，感叹历史兴趣，富贵殆尽，只有这岿然石鼓却是永恒的存在，成为我国传世的宝物（今存北京)。全诗六十句,用词典雅而摹写入微,结构严谨而时起波澜,刻意锻炼,惨淡经营。这之前韩愈也写过《石鼓歌》,苏轼此诗有意和他争胜，终于成为吟诵石鼓的两篇名作。

苏轼在凤翔任职三年多，于宋英宗赵曙治平二年（公元 1065 年)正月还朝,以殿中丞(管理宫廷事务的殿中省的官员)差判登闻院(受理官民建议或申诉的机构),又经过学士院的考试,授官直史馆(编修国史机关的官员)。这时,他的家庭发生了重大变故 妻子王弗卒于京师；接着父亲苏洵又病故，他就和苏辙一起扶柩从水路回蜀，并为父亲守丧家居。

三、汴京风云

宋神宗赵顼熙宁二年（公元 1069 年),苏轼守丧期满,又从陆路度秦岭、经关中,第三次来到京师(以后他就没有再返故乡)。他历任殿中丞、直史馆和差判官诰院等官职。这一次，等待他的是一场统治阶级内部新旧两党的激烈斗争。

这年二月,宋神宗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(副宰相),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变法运动。王安石是位有志于改革的政治家，在此以前他曾在鄞县(治所在今浙江宁波)、舒州(治所在今安徽潜山)、常州(治所在今江苏常州)等地担任地方官,试行了若干改革措施,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变法理论和方案。嘉祐三年（公元 1058 年）他写的长达万言的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就是代表作。到了这时，他受命执政，立即建立起一个“制置三司条例司”作为主持新法的新机构。

王安石新法的具体内容可分为理财和整军两类。属于理财的有青苗法、免役法、均输法、市易法、方田均税法、农田水利法等;属于整军的有减兵并营、将兵法、保马法、保甲法等。以外,王安石又改革科举制度，以便为推行新法提供人才。

理财是为了“富国”,整军是为了“强兵”,最终目的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，对付社会危机，巩固赵宋王朝的封建统治。但是，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豪强、贵族、大商人的利益，因而引起了他们的激烈反抗。变法开始后，韩琦、欧阳修、富弼等元老重臣纷纷出来反对，他们从庆历、嘉祐时代的主张改革变成了攻击改革的中坚人物。不久，一批守旧的封建士大夫就联合起来，形成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变法反对派。他们随后又得到仁宗妻曹后（太皇太后）、英

宗妻高后(皇太后)和神宗妻向后的支持,势力更为强大。

司马光、韩琦、张方平、范镇等人,政治思想趋于保守。对苏东坡有一定影响或起过制约的作用。因为，有的人有恩于他，有的人与他的交往至深。韩琦、张方平是苏东坡的世交，非同一般的交往。范镇与苏东坡同是川人，又是忘年之交。

司马光之所以会影响苏东坡，恐怕是学识之相近，观点之相仿，英雄所见略同罢了。苏东坡曾说过这样的话：

“且诏天下,譬如居室,弊则修,非大坏,不更造也。大坏而更造，必得良匠，又得美材。今二者皆无有，臣恐风雨之不庇也。苟得其人，则无患法之不善。不得其人，虽有善法，失先后之施也。故当急于求人,而缓于主法也。”

基于这种思想，他对变法产生了轻蔑的态度。新派的力量不及以司马光为首的阵营严整。重臣名流云集于其麾下。使平衡器一头高高翘起，一头低低垂下。毕竟苏氏兄弟年轻，又出仕不久，就遇到如此激烈的政治洪流的冲击，令他们茫然不知所措，轻易受人牵制是在所难免的。其弟苏辙当时在新派一边工作，却心猿意马。苏东坡这样评判当时的形势：

“熙宁元年间,士大夫论天下贤者,必曰君(司马光)、景仁(范镇),其道德风范是以师表当世,其议论可否,足以荣辱天下。”此言足可看出苏东坡当时的立场和心境了。

前面已经说过，苏辙对新法也表示过异议，引起王安石等人的不悦。于是苏辙预感到自己面临“妄语自知当见弃”的处境。因此，他争取主动，奏请外任。神宗看到奏折，问王安石：

“辙与轼如何？观其学问颇相类。”

“轼兄弟大抵以飞钳捭阖为事。”王安石回答。

王安石看出了苏辙的政治立场不坚定：“飞钳捭阖”是批他专事察颜观色以投人所好，伺机行事，变改的旗帜不鲜明。神宗批准苏辙所请，外放任职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苏辙是可以争取的，没有争取，反而被王安石一句话排斥出去了。他只是耿心自己说了不合潮流的话，受到歧视，并非与新法有势不两立的矛盾。“妄语”即有认错的意思。若稳住了苏辙，苏东坡亦稳住了，至少不会马上跳出来，以雷霆万钧之势炮轰新法。把可用的力量，变成了摧毁自己的炮弹。这不能不归咎于王安石用人政策的失误。苏辙、苏轼开始失势，令他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“多余人”的地位，继而发现局势于国于已均不利。所谓于国不利，他认为王安石变法是以“悍药毒石”治理久病虚弱之人。于己不利，则因为王安石当政使他自己的前途变得非常黯淡。因而，苏东坡与王安石这两个都效忠皇室，都愿变革走富国强兵之路，同目的而异己见的当世奇才，终于对立起来，最后两败俱伤，导至国家日渐衰落走向灭亡。

四、宦游江湖

熙宁四年（公元 1071 年）十一月，苏轼离开了党争漩涡的汴京，任杭州通判。这也就结束了他创作上的危机。此后他又相继在密州(治所在今山东诸城)、徐州、湖州三地任知州。

在朝两年多的政治生涯表明苏轼算不上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，但在近八年的地方官任上却显示出他不愧为一位关心民生、有所建树的良吏，同时也使他的文学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，带来了创作上的第一个丰收时期。

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，在杭州。知州陈襄修复钱塘六井，解决了人民的饮水困难，苏轼作《钱塘六井记》加以表彰。在文章结尾处他特别提醒说："余以为水者，人之所甚急，而旱至于井竭，非岁之所常有也。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，此天下之通患也，岂独水哉！"有备方能无患，对执政者发出了谆谆告诫。常州、润州(今江苏镇江)发生灾荒，他前去"赈济"，除夕之夜还野宿城外，作《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》，其第一首说：

> 行歌野哭两堪悲，远火低星渐向微。病眼不眠非守岁，乡音无伴苦思归。重衾脚冷知霜重，新沐头轻感发稀。多谢残灯不嫌客，孤舟一夜许相依。

荒郊外，孤舟中，或吟诵或哭泣，都充满了悲哀之意。村火、星光，又是如此暗淡。长夜不卧不是为了守岁而是由于眼病，周围听不到乡音更使人想回故乡。几床被子仍挡不住脚冷，才知霜重，刚洗头顿觉头轻，原来是头发越秃越少。气氛这样冷寂，只有一柱残灯

陪我度过长宵。个人心绪是这样的低沉抑郁，但他对“赈济”公事，仍能勤于职守，这就难能可贵了。

西湖山水为苏轼带来灵感，苏轼描写西湖的诗作常常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句。他善于从动态中去捕捉景物的特点。如“天欲雪，云满湖，楼台明灭山有无。水清石出鱼可数，林深无人鸟自呼。”写出冬天将雪未雪时的湖上景象：楼台忽明忽暗，山峰若有似无。“朝见吴山横，暮见吴山纵，吴山故多态，转折为君容。”（《法惠寺横翠阁》）则写吴山变幻多端的状态 早晨看吴山清晰，横亘如带，傍晚隐约，只见高耸成堆，多姿多采，供你观赏。

在描写西湖的诗中，流传最广的还是要数《饮湖上初晴后雨》这首七绝：

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。欲把西湖比西子
淡妆浓抹总相宜。

以西施浓妆比西湖晴景，以淡妆比雨景，不论是晴是雨，西湖总以她的旖旎风光令人心旷神怡。这个新颖、贴切的比喻，被认为是所有咏唱西湖的篇什中最为确当的评语，以致从此“西子湖”成了西湖的别名。难怪后来的诗人为之搁笔：“除却淡妆浓抹句，更将何语比西湖？”

从苏轼词集可以看出，他从通判杭州时才开始填词。这是他这时期文学创作的新内容、新特点。在他以前的北宋词坛上，婉约派占统治地位，内容大都写男欢女爱，离愁别恨，流连光景，风格婉曲缠绵，未能跳出词为“艳科”即专写男女之情的樊篱。但象范仲淹《苏幕遮》（“碧云天”）、《渔家傲》（“塞下秋来风景异”）、欧阳修《朝中措》（“平山栏槛倚晴空”）、《渔家傲》（“十二月严凝天地闭”）等，开拓题材，大笔振迅，寄慨遥深，已开豪放词派的先声。苏轼这时期的词作，虽然还未形成豪放词风，但已有明显的“以诗为词”的

倾向，一定程度上打破了“诗庄词媚”的传统界限。杭州知州陈襄是位有政绩的官吏，苏轼和他相处很好，有不少词作写到两人的友谊：

湖山信是东南美，一望弥千里。使君能得几回来？便使樽前醉倒更徘徊。沙河塘里灯初上，水调谁家唱。夜阑风静欲归时，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。

——《虞美人·有美堂赠述古》

回首乱山横，不见居人只见城。谁似临平山上塔，亭亭：迎客西来送客行。归路晚风清，一枕初寒梦不成。今夜残灯斜照处，荧荧。秋雨晴时泪不晴。

——《南乡子·送述古》

前首为陈襄离杭前宴别时而作，后首写的是在杭州东北临平船中的送别。传统婉约词写离恨，常常是设色浓艳，抒情纤细，且大都是倚红偎翠、浅斟低唱一类男女别情；苏词也写得情深意长，回肠荡气，但语言明净，意境鲜明，突出友情的诚挚，透露出与婉约词不同的倾向。

熙宁七年——熙宁九年，在密州。苏轼一到任，遇到一场好雪，高兴地写下“今年好风雪，会见麦千堆”的诗句，盼望丰收。然而，不久严重的蝗灾发生，他要求朝廷蠲免秋税。他虔诚地斋戒吃素，为民祈福，写诗说“：而我食菜方清斋，对花不饮花应猜。”由于连年饥馑，“民多弃子”，他就设法召人收养，由官府每月补助粮米六斗，这样救活了几千人。他亲自沿城捡回弃孩，痛楚地写下“洒涕循城拾弃孩”的诗句。还说，在密州虽然公务繁忙，生活也甚为清苦，但比起在汴京的党争生活来，却要好得多：“为郡鲜欢君莫叹，犹胜尘土走章台。”尤其可贵的是，人民生活的痛苦使他深感内疚，

自叹饱学儒家经典竟救不了灾荒："秋禾不满眼，宿麦种亦稀。永愧此邦人，芒刺在肤肌。平生五千卷，一字不救饥。"这对旧时奉为神圣的儒家经典不啻是一个辛辣的讽刺！

苏轼虽已离杭来到密州，但对杭州仍然怀着亲切的感情。晁端彦(字美叔)是他同科考中的"同年"，这时在杭州任两浙提点刑狱，苏轼写了几首诗给他。在《忆西湖寄晁美叔同年》中说："西湖天下景，游者无愚贤，深浅随所得，谁能识其全。"作者却"独专山水乐"，在"三百六十寺"中，"幽寻遂穷年"，深深地体会到它的妙处，"至今清夜梦，耳目余芳鲜"。诗的首句"西湖天下景"已经题在今天杭州孤山的中山公园一座亭子的匾额上，人们赞赏着苏轼对西湖的品评。后来晁端彦因事罢职受审，苏轼在《和晁同年九日见寄》中劝慰他说："遣子穷愁天有意，吴中山水要清诗。"这是继承了我国古典文艺理论中"不平则鸣"(韩愈《送孟东野序》)的见解，也是前面所引苏轼自己所说"诗人例穷蹇，秀句出寒饿"的继续发挥，说明在封建社会中，只有遭受压抑排挤的人，才能通过切身感受写出有生命力的作品。

苏轼的词在密州时期有重大发展，初步形成了豪放词风。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和《水调歌头》("明月几时有")等就是代表作品。

老夫聊发少年狂，左牵黄，右擎苍。锦帽貂裘，千骑卷平岗。为报倾城随太守，亲射虎，看孙郎。酒酣胸胆尚开张。鬓微霜，又何妨！持节云中，何日遣冯唐？会挽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。

——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

这首词作于熙宁八年（公元1075年)冬，时作者四十岁。词的前半阕以三国时孙权自况，极言出猎的壮观。后半阕又以汉文帝时魏尚自比(一说以冯唐自比)，希望能被朝廷重用去守卫边疆，狠狠打

击侵扰国家的敌人。苏轼说这首词曾“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,吹笛击鼓以为节,颇壮观也。”苏轼在《与鲜于子骏书》又说“:近却颇作小词,虽无柳七郎风味,亦自是一家,呵呵!”说明他有意识地要在婉约派代表词人柳永之外“自是一家”,他对开宗立派是颇为自豪的。

次年中秋,皓月当空,银光泻地,苏轼想起分别七年的苏辙,如今在济南不能前来团聚,不禁心潮起伏,写了另一首名作《水调歌头·丙辰中秋,欢饮达旦,大醉作此篇,兼怀子由》:

> 明月几时有?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,今夕是何年?我欲乘风归去,唯恐琼楼玉宇,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,何似在人间?转朱阁,低绮户,照无眠。不应有恨,何事长向别时圆?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,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:千里共婵娟。

全词以问天、问月来探索人生的哲理,抒发兄弟的手足情谊。全词笼罩一层迷惘、惆怅的气氛,但词的境界廓大明朗,这在一些婉约派作家所写的秋词中是罕见的。胡仔曾说:“中秋词自东坡《水调歌头》一出,余词尽废。”从词的开创性来说,这话并不过分。

苏轼在密州时期的词作,标志着豪放词风的初步成熟,为词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。

熙宁十年——元丰二年(公元1079年),在徐州。苏轼到任不到三个月,澶州(治所在今河南清丰西)曹村的黄河大提决口,水淹四十五个州县,三十万顷良田。徐州城下也水涨高达二丈八尺。苏轼后来有诗描写当时危急的景况说:“黄河西来初不觉,但讶清泗奔流浑。夜闻沙岸鸣瓮盎,晓看雪浪浮鹏鲲。”又说“:坐观入市卷闾井,吏民走尽余王尊。”大水滚滚而来,已浸入市,汉代东郡太守王尊力拒黄河水患,愿以身填堤,坚守大堤,作者作为一州之长,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